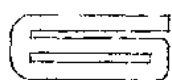


育汉语

由文系中二函二班編

用

陸泉达 編



文編 廣朋 詩 振 意 易
步 恒 叔 訂 段 世 參 考

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編

信師一附路 學年度第一學期

古汉语讲稿

·陆宗达讲·
张之强、李元大编

第一章 绪论

一、古汉语概念

语言科学是由具体语言概括出来的，由实际的语言材料提高到理论。所以研究古汉语时，首先要明确根据什么语言材料。其次，古汉语的所谓“古”，时代是非常长的，差不多有两千年到三千年。由于近代的研究及现在对于古汉语研究的科学水平，还不可能把所有两三千年来的古汉语所有的课题完全讲到，事实也不可能，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古汉语的研究范围。

古汉语所根据的语言材料。

研究古汉语是依据历代的书面材料，但是对于这些材料要有两个条件：第一，比较能完整的、真实的反映当时的语言实际情况；第二，对于后代汉民族语言的发展能起影响作用。因为有两个标准，所以先把能在古汉语里包括的材料介绍一下，然后再确定我们古汉语研究的范围。因为汉民族语言历史很长的，所以讲到古汉语材料的问题也需要分期。

现在一般的把古汉语分为四个时代：

1. 第一个时期——先秦：这一部分材料很多，如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材料，最早的有甲骨文，但这个材料在古汉语中不是主要的，只能是辅助的材料。当然它对文字的发展很重要，但是对整个语言来说，因为它都是断简零篇，所以重要性不大，不是主要材料。其次，周初的钟鼎文，这种材料虽然在古书中记载的很多，但在古汉语中也不是最主要的，最主要的材料是

《说文解字》

，其中有几部书是古汉语中最重要的材料：

诗经：它虽然是诗歌，在语言中是另外一种形式，但在古汉语中是很主要的材料。因为诗经所代表的是当时的所谓“雅言”，雅言这个词是“论语”中提出来的，“子所雅言。诗、书、礼、乐。皆雅言也”。（述而）孔子原为鲁人，但在诵诗念书，执礼时说的是雅言。“雅”实际是“夏”字，因为在当时“雅”有时就说成“夏”。可以引荀子作证明，荀子在荣辱篇中说“楚人安楚，越人安越，君子安雅”。（注：君子，中央作官的人）而在儒效篇中同样一个意思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的：“居楚而楚，居越而越，居夏而夏”。所以“雅”就是“夏”。夏（雅）代表国都，古代常把中国叫“华夏”，是指中国的发源地——华山、夏水。所以也用此来叫帝都。因此雅言也就是国都语，也就是以国都语为标准语，也就是后代所谓的官话。所以诗经反映了国都话，就是反映了当时的标准语。孔子论诗时说的是官话，因为诗经本身就是个官话的东西。因此还可以澄清一个问题，诗经是因各地采的民歌，但根据周礼记载，经过太师协律变成了“乐语”（用国都的音乐调和以后变成了乐语）所以诗经是经过加工的东西。又可以证明一个事情，诗经虽是十五国风，但它的押韵是一致的。（除去秦风有一两个不同的地方）因为它经过协律，是用标准语加工的。所以在前人考证古音尤其是同音时最主要的是根据诗经，因为诗经反映的是标准音。第二点，诗经的语言，它所表达的方面非常丰富多采。我们知道语言是跟它各种生活结合起来的，诗经材料虽然不多，但它反映了生活的各方面，它反映了生产，渔猎生产，农业生产，它反映了政治，（尤其是小雅）也反映了阶级斗争，也反映了爱情，也反映了战争。所以它通过社会生活的结合，它的语言也是丰富多采的。所以我们认为诗经在语言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材料。

现在我们用第二个条件来衡量一下诗经。诗经在先秦的时候大家就接受它的影响。如孔子说过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（季氏）。所以先秦时的语言就受诗经的影响。这至少我们可以分两点来说：第一点在当时就拿诗经做为交流思想的工具。先秦时以赋诗交流思想，左传上有许多赋诗句作为外交辞令；如公子重耳到了秦国，见秦王时，见面时他当然就要表示自己的意思。左传是这样记载的，“公子赋河水，公赋六月，赵衰曰重耳拜赐。”“河水”是诗篇名，现在亡佚了，是表示河水要朝宗于海的；我们的才量是有限的，希望依附你，即是用“河水”表示他的愿望，“六月”是小雅中的一篇，是说尹吉辅佐宣王伐玁狁，喻公子重耳必能匡匡王图。还作诸侯的意思。

在赋诗谈话时也引用诗经：如“武叔懿子围郕，弗克。狄，二子从齐师复围郕，弗克。叔孙谓郕工师驷赤曰：‘郕非唯叔孙氏之忧，社稷之患也。将若之何？’对曰：‘臣之业在揭水，平章之四言矣。’”（左传定公十年）这段故事是说鲁国本来有三家，孟孙、叔孙、季孙。叔孙氏有一个属地叫郕，守郕的侯犯到了叔孙氏，叔孙氏就派兵把郕围起来了。打不下来。这时齐国也来了，也打不下来。叔孙氏就找到侯犯手下一个最重要的人，他的官是工师，叫驷赤。叔孙氏就跟工师驷赤说：“郕不仅是叔孙氏的忧愁，因为齐国也来了，如果让齐国打下来就是国家的损失，国家的忧愁。你说怎么办呢？”工师驷赤了解了叔孙的意思是叫他起义，所以就说：“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唐风揭之水那篇诗的最后一章的第四句话”。原文是“不敢以告人”，也就是不能告诉人的秘密行为。左传原文下面是“叔孙稽首”叔孙听见他答应起义了，所以就给他磕了个头。由此可以看出诗经可以作交流思想的工具，赋诗经就可以反映了很多意思，所以对当时的语言起了很大作用。

诗经对后代的语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诗经有很多合成词在现代汉语中还生存着，如“中央”、“光荣”、“骄傲”、“正直”、“悲伤”。在构词形式上对后代影响也很大，如在利用叠迭的词汇上，“灼灼”、“天天”、“依依”，以至影响到唐人诗。诗经有很多联绵词，这是东方语言，尤其是汉语中的一种最发展的形式。“双声”是开始的语音相同，“参差”、“容易”。“叠韵”是收尾的音相同，“琐尾”、“玼玼”。这种双声、叠韵的词在诗经中很多。另外，诗经在名词上也有一些词头、词尾的现象，如：“鹿斯”、“鑫斯”、“柳斯”影响了后世的“子”。所以诗经一直影响了后代民族语的特点，提供了一种发展的道路。

散文方面：

论语：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，我们用第一个条件来衡量，它是现存的古代第一部基本上用口语记录的东西。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语言实际情况，论语每章都很短，非常生动活泼，不是活的口语不可能这样。如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，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。回也不愚。”（为政）“我跟颜回讲道理，讲了一天，颜回没有说话，一点反映没有，简直是个傻瓜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去检查他自己怎么样，也能够在实际中把它实践出来，敢情颜回不是傻瓜。”说的很婉转、生动。所以这部书确实用口语记录的，是很重要的语言材料。其次我们用第二个条件来衡量一下，论语对后代语言的影响也很大。从汉代就把它当做必要的读物，尤其是由唐到清都把它做为学习的基本读物。自秦以后，口语与书面语言脱节，直到唐代才又重新出现用口语记录的东西，这就是和尚的语录——禅宗语录。它是模仿论语的，从这一点看，也可以证明论语是用口语写的。所以论语很重要。

孟子：语言方面也非常好，古时有人说尤其是“明白、流

畅、丰富、生动。”‘孟子’不完全是口语，已经有些是有意的做文章，但‘孟子’表现了运用语言的能力。也是后来的基本读物。

左传：也是很重要的语言材料。它记载了二百四十年的事情，政治、军事等。因为它应用语言很生动，记载了许多社会风俗，描写了许多人的心理状态，记载了、保存了一些古代的神话传说，民间故事，所以左传的词汇特别丰富。在语言方面很重要。

楚辞：是指屈、宋作品，因为楚辞中也有汉人的作品。(一)反映了当时楚国的方言，是一种方言文学。楚辞的韵脚很明显与诗经不同，词汇也不一样，如屈原《离骚》“謇”、“些”。古代是叫楚辞和雅言对比，汉扬雄‘方言’中载有楚语，所以以后凡是方言文学都叫楚，一个人说的是方言就管他叫楚，如南北朝时刘裕人家说他“高帝创业江南，楚风未改”。说他的方言老改不过来，刘裕是徐州人，不是楚人。所以楚是方言的代名词。

以上所讲的是古汉语中最主要的材料。(一)因为他们反映了时代的特点；(二)反映了方言的特点，诗经是西方语言，论语、孟子是齐鲁语——东方语言，楚辞是南楚方言。

第二个时期——秦到西汉：秦始皇对语言的发展有很大影响。秦统一后要在书面语言中规范一下，要消灭方言，统一书面语言。但秦的统一只是政治上的统一，而其他条件，如经济条件等都不具备，根本不可能使语言规范化。所以他是用文字来统一的。这一点对汉字来说是很容易的，因为汉字不是标音的。秦的焚书也是为了统一文字，消灭东方文字，用小篆。关于这件事情在说文序上有记载：“其后诸侯力政，不统于王，悉礼乐之害已，而寄去其典籍，分为七国，田畴异亩，车途异

轨、律令异法，衣冠异制，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，所作‘仓颉篇’，中书府令赵高作‘爰历篇’，太史令胡毋敬作‘博学篇’，皆取‘史籀’、‘大篆’或颇省改。所谓小篆者也。所以从秦开始书面语与口语脱节。李斯的文章就是开始与口语脱节的；他的文章直接影响到魏晋南北朝的骈文，所以骈文实际是由李斯开始，他的文章是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典型。所以秦是先统一文字，然后再书面语规范化。在书面语中确实规范了，可是实际语言并没规范。如有秦以后只有皇帝才能称“朕”，而秦以前什么人都可以。这是秦始皇下令规范的，但在现实中并没规范，如现在河南人我称作“咱”，实际上就是“朕”，所以在语言上他没法规范，这就造成了口语与书面语渐趋脱节的现象。

史记：两汉作品中，可以代表当时语言特点的，有史记。这部书不仅在文学上史学上是伟大著作；同时，作者还能运用当时的语言进行创作。怎样可以证明呢？

(1) 史记是根据以前的史书来修订的，所以首先可以看史记与它原来根据的史书在语言方面是否有所变化：

例如，史记五帝本纪中，关于尧舜的事实是根据尚书里的“尧典”。把“尧典”和“史记”的语言对比一下，就看出变化非常大。

(一) “尧典”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允厘百工，庶绩咸熙”。史记中是：“信饬百官，众官皆兴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：“根本能诚恳地利用百官，所以搞了很大成绩。”很明显，史记是用当时的语言把尧典里的这句话翻译出来了。如何知道的呢？

中国有一部最早讲字义的书，尔雅。它是汉人的作品，有人曾认为是周公、或孔子内人作的，这不对。因尔雅中所记载的许多制度是汉朝的制度。它是用汉朝的词解释以前的词，是词

文字中最古的一部书。) 尔雅里有：元，信也。釐，饬也。百，工，百官也。庶，众也。绩，功也。咸，皆也。熙，兴也。这与史记中所换用之词相同，看出史记是以汉代词汇代替古词汇。

(二) “尧典”：“有能俾乂”。

史记：“有能使治者”。

意思是：“如有能让他去治理的这样的人”。不但史记与尧典用语不同，同时也看出语法上也有变化。(尔雅也说“俾，使也。”“乂，治也。”)

(三) 汉代语言与先秦有很大不同，举一段简单的句子就可了解：

史记刺客列传 写在荆轲传之后面 有一段是记高渐离的：“久之，作苦。觉其家堂上客击筑，傍徨不能去。每出言曰，彼有善有不善。以告其主。曰，彼庸乃知音，窃言是非。”

高渐离是荆轲的好朋友 是一个音乐家，善于击筑（古乐器，用竹筒作），荆轲死后，高逃亡，隐了姓名，在一个酒馆中做所谓“酒保”。

“久之”，“久”是时间词，在时间词后加“之”，以前这种用法很少，“其家堂上客”，“堂上”附加于“客”，“其”附加于“家”，“其家”附加于“堂上客”。这种附加语的形式以前也很常见，这与现代汉语的附加语形式相近。“每”是时间副词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常”。“彼有善有不善”，把肯定与否定的同数在一句中，这形式汉朝常有。“乃”在先秦多为转折词，没有增加另外的感情；汉时不但有转折的意思，同时附加一种感情——“出乎意料之外”，与现代汉语的“居然”相似。史记这用法很多。（例，至拜文将乃斩信也。）

从这简单的几句话中 看出史记的词汇、语法、虚词用法、

句子结构以及语言的风格和先秦有所不同，所以肯定史记是运用了当代的语言。

我们觉得，史记中有两部分可注意：

（一）词汇，尤其在词的结构上，又比古代发展了一部分。

例如，“利害”一词，首见于吴王濞传，这是把两个意义相对立的词结合在一起，表示另一个意义。又如：刺客列传中，聂政说：“多人不能无生得失。”“得失”只是“失”的意思，这是把两个相对立的词结合在一起，只取一方面之意义。这与现代汉语的“兄弟”，只是“弟”的意思相同。

（二）语法：也和先秦不同。

例如，史记陈平传“船人见其美丈夫”

先秦用“其”，只代表“他的”，不代表“他”。如庄子逍遥游：“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”。可以把“其”换成“风之”，但不能换成“风”。也可以把“风之”换成“其”。“之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的”。则这句话成为“其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”，或“风之积也不厚，则风之负大翼也无力”。从史记开始，“其”可有另一用法。“船人见其美丈夫”，即“船人看见他是美丈夫”，是判断句。“其”不代表“他的”而代表“他是”。

史记是运用了汉代语言，表现了时代特点。在汉代，这样的书很少。除去当时的乐府有很多口语或其中有对话的口气之外，诗的材料不多。但是史记只反映汉代语言之特点。

总之，在第一个时期的书面语，反映了时代特点，方言特点。在第二个时期的书面语，只反映当时语言的时代特点，不能反映方言特点。

3. 第三个时期——魏晋南北朝时期：这个时代的主要书面语言是少数文人所规范之语言，只有少数受过训练的人能拿它

作为交际工具，因为这时的书面语与口语已经完全脱节了。

例如，昭明文选中，任彦升的“奏弹刘劭”。这篇文章前边有一段刘劭去见刘劭的爱人的“口供”，这是当时的口语。任彦升就根据“口供”来弹劾刘劭。我们对这一段口供根本看不懂，后面的文章倒看得懂，因为前边的口供是口语，后面的文章是散文。证明当时的文章与口语完全脱节，书面语是文人根据先秦所发展的一套完全脱离口语的语言，这只有受过文学训练的人看得懂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也有许多汉朝所没有的词汇，是文人造的词汇，它只靠影响书面语言。

例如，六朝诗人嵇康养生篇：“交赊相倾”。

“交赊”怎样讲呢？从文选中沈约的阮嗣宗诗中知道“交”是“近”，“赊”是“远”，即“远近的人都爱慕他”。又如：“望实”，“望”是“名誉”，“实”是“内容”。这只有南北朝时产生，这种词汇是文人造的，不反映当时语言。

在这个时代有一部书，还能反映了一部分口语，就是“世说新语”。

世说新语的内容是记载当时人的行动和语言。在文学上善于描写人，并且运用语言也精炼生动。但这书中的语言不是一般的生活语言，而是所谓文人“艺术化”的语言，它与当时的书面语不完全相同，和口语也不一样，是文人的口语。（例如当时的文人爱讲歇后语，在颜氏家训中有这样一句，“庾亮吴人，遂成司隶”。这是晋文帝派刺有人把“郢”念成“永”，春秋经有一句，“庚辰吴入郢”。“司隶”是汉朝的官名。第一个作司隶的人叫郅永。（书记载郅永三世为司隶）就是把“庾亮吴人郢”的“郢”，念成作司隶郅永的“永”。这样的语言别人很难懂。这也是当时一种艺术化语言的形式。

世说新语对后代的语言影响很大：

(一) 判断句用“是”。魏晋以前判断句不用“是”，只是在名词之后加“者”后面用“也”。即“××者，××也”。或“××，××也”。“是”只作代词用，没有当判断词用过。世说新语中，开始有判断句加“是”。例如，有一段司马昭和邓艾的对话。邓艾口吃，说话时老“艾艾……”。司马昭就说：卿云‘艾艾’，实是凡艾？”邓艾对曰：“‘风分风分’，故是一风。”这反映了当时的“是”的用法。（见言语第二。）

(二) 魏晋以前，否定句中如有代词，就把作宾语的代词提前。如论语，“时不我待”。“我”放在动词“待”之前。世说新语中，这类句型没有了。如：“我不如钱”。如果以前就会写成：“钱不我似”。又如：“不患莫己知。”把代词“己”（宾语）放在动词前面。世说新语就不这样，如：“卿莫负我”。“莫”，相当于现代汉语之“别”。即“卿别负我。”证明在语法上，也与前人有不同之点。

(三) 在词汇方面，世说新语有很多词发展为现代汉语的词。如“都”，“了”。“了”字在世说新语中很多，有时当副词用，不当语气词用。

4. 第四个时期——唐宋以后，到现代汉语以前：

这时的书面语分成两个支流。

(一)，一支是完全与口语脱节的规范化。文学语言，即后来所谓的“文言文”。是已经成型的文学语言。包括散文、骈文、赋、诗、词。

(二)，另一支是新兴的书面语。以口语作基础。这就是白话文。首先是唐朝和尚的“语录”，后来宋朝也有很多语录，都是口语形式。

其次，唐宋民间文学发达，所谓“俗文学”，敦煌石室发

现很多。

再次，当时的外交记录，如“三朝北盟汇编”。诗

另外，还有诸宫调、话本、元曲、小说以及笔记中记录的片断对话。

这些是在口语基础上的书面语。所谓“文言”、“白话”之分，是由此时开始。

这两个支流互相也有影响。主要是在词汇方面。如唐人诗、宋人词中有许多口语词汇。元曲也吸收了诗词中的文言词汇。

一方面分道扬镳，一方面互相影响。如西厢记，有的完全是诗词中的句子，有的又完全是口语。例如：“四围山色中，一鞭残照裏。”（阳春白雪卷三马致远寿阳曲：“四围山，一竿残照裏。”）另外像“不念法华经，不礼梁皇忏，脱了僧伽帽，褪下我这偏红衫。”这又是口语。

二. 古汉语的范围。

研究古汉语不能与现代汉语对立起来，而是为了更好的结合现代汉语。因为一个民族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很重要，有许多现代汉语现象可以由古汉语，由历史上去解释。在“语言学概论”中强调语言科学主要是“历史比较法”，所以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应很好的结合。另外，现代汉语也可以追溯到古汉语融汇的语言变迁。可以整个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。如现在常用的成语：“无理取闹”。这个成语是由唐韩愈诗中：“无理只取闹”的诗句中来的。这类的例子很多。

同学们在学古汉语时，常提出两个要求。第一，要求了解从先秦到现在的口语基础，用此线索来证明现代汉语的语言规律。这个目标是好的，但是中间有困难。因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口语现在不存在了，所以很难把口语一直贯穿下来。第二，

要求把“文言”和“白话”分成两个支流研究。文言文我们可以由先秦研究到唐宋，（因唐宋以后文言文的退化很迟。）但是研究白话文的条件就很不够。因前人对白话的发展未经过研究，至于“白话”的语言科学尚未建立一个系统，而对于古汉语文字部分做了很多工作。所以今天只能接受前人讲过的，确定了科学。

因此，我们所讲的古汉语的范围，即文言文。从先秦到唐宋时代的文言文。

三 古汉语各部门：

语言是整体的，是一段一段说的，是成片的。如想说“今天很冷”。是用整个一片儿来交流思想，决不是先在脑子里准备好几个词汇，准备好语法，摆好了发音器官，然后再说出来。但在科学研究上就必须分析如我们接受的古汉语也是成片的语言，我们首先要分析它是用什么书写形式，就是什么工具记录下来的。这就分析出文字这一部分。然后再分析它所表达的语音结构是什么，这就是语音部分。再分析从这片儿语言中能抽出多少表义的单位，这就是词。再研究这些表义单位是怎样结合起来的，它的结构是什么，这就是语法。再研究怎样成一个段落或一个片儿就是句读。在表达方面的特点怎样，是什么表达方法。所以语言是个整体，在科学研究上应当分析，由这样分析的结果，在古汉语就分出几个部门。分析之后每个部门要概括出它们的规律，最后再综合起来研究整个语言。科学上的分析的目的不是分裂，最终的目的是要综合。这一点应特别注意，在解放前有人的研究是分裂，如有人研究孔子的思想，有人研究孔子的政治，有人研究孔子的教育……而不是综合的研究，结果把孔子给寸磔了。我们的分析是为了更好的综合的研究。

究。

1. 文字：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，语言在时间上、空间上有局限性，远了，时间过了就听不见了。用记录的工具就是把它的局限性解除。古汉语就是靠了记录工具流传下来的。文字在讲现代汉语时提到要改革，但汉字也有它不可磨灭的功绩，即是靠着它记载了三千年的文化，所以研究古汉语就必须深入研究文字，尤其是研究先秦的作品，因为汉字与当时的语言情况相适应，所以就必须深入研究汉字。

一个记录语言的工具应要求把这个语言的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的特点记录下来，如汉字记录语音是记录它的音节，汉字用形象来记录不同的词，如单音词同音词在古汉语中很多，但用不同形式记录下来，“晨，臣，陈”。音同而形不同。记录语法结构，汉语语法主要是靠虚词与语序，所以汉字中有一部分虚词，在排列上有语序，对一种书写工具要求他每样都记得很好是很困难的。

我们先了解一下汉字在记录语言方面的优缺点，

(1) 汉字在记录古汉语中的缺点：主要表现在记录语音方面。语音最重要的是音节，因为在有音节以上才能表达意义，音节是表义的最小单位。而语言是表义的，所以音节在语言中很重要。汉字能记录音节不是很好吗？但这里有毛病，一个音节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。一个是这个音节是怎样构成的；另一个是音素在排列方面的系统，那个能排列，那个不能排列。所以表达一个音节要能表达的一个是音节结构，一个是音素系统，这样来记录音节才能比较准确，另外声音是有变化的，而且变化很快，但它是受它的结构、系统的限制而变化的，所以这两方面很重要，一个是才能准确，一个是怎样变化才能看出来。

首先，汉字标音不够准确，在古代就发出这个问题。“华人出于文，所得从见入；梵人出于音，所得从闻入”。（郑樵）把拼音文字叫耳治文文字，把汉字叫目治文字。所以从宋就感到汉字标音很有缺点。明末就更感到汉字在标音方面缺点大。所以要改革文字从明末就开始了。方以智（通雅）、杨选杞（声韵同然集）、刘献廷（新韵谱）他们受明中叶耶稣会士的影响很大，当时传教士到中国来，主要是意大利人，如利玛窦、金尼阁，首先他们得研究中国语言、中国文字，把中国字用罗马字母拼音，研究解释出很多现象，用罗马字母研究汉字，金尼阁著有“西儒耳目记”。他们三人受金的影响很大，在声韵同然集中说过“讲中国语言时可置之于口，不能形诸笔墨更为可恨”，所以汉字音节符号只是方块字，没有音节结构，也没有音节系统，不能记准确。

语音变化很大，可是汉字表现不出来。所以现在读古汉语是目治之学，因为古代怎样听不知道，是用现代汉语读音来听，甚至是用方言听。如“洛阳迦兰记”记载了当时有一种女人的语言，叫“体语”。发展到现代所谓‘拗口令’，（说成绕口令）就是组织语言时是用双声来说，因为佛经中管声母叫“体文”。

“陇西李元谦尝过郭文远宅。元谦曰‘是谁宅第？’婢春风曰‘郭冠军家’。李曰‘凡婢双声’，春风曰‘行奴漫骂。’”用现在音读起来有的已经不是双声了，当时应该读成‘ti tui tai ti’（是谁宅第）‘kue, kuan, kiun kja’（郭冠军家）‘pan pai suan san’（凡婢双声）‘niy, nu man ma’（行奴漫骂）所以都是双声。

如太平广记“御史侯思止言语鄙俚，时武则天禁屠，思止谓同列曰‘鸡（机）猪（株）鱼（虞）蒜皆不得喫。’举朝大笑。”大家笑思止说错了音，不合当时的标准音，可见当时鸡机、猪株、

惠虔的声音是不相同，而我们现在已经是不分了。

因为汉字是方块字，所以这种语音的变化表示不出来。

(ii) 汉字的特点、优点，表现在词义方面。

汉字反映了形象，在古汉语中非常重要，如“天”，天所反映的形象，不是天地的形象，而是表示一个人的脑顶，“大”，大表示人的形状，而“天”表示人的形体上最高的地方。因为这个意思，所以才把在天地中最高的地方叫天。它反映了词义的最初根源，据此才能读通古书，如易经“其人天且劓”(nie)劓是把鼻子割掉，天根据上面讲的意义是人的脑顶，而这地方也讲的是刑法，所以汉马融“鲸鲵共额曰天”。这种情形如不从汉字的形象来理解是不能了解这种情形的。如山涛经“刑天无首”。所以汉字对了解词义、词义的根源帮助很大。

汉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；如“襄”；说文“襄，汉今解衣耕谓之襄”。什么叫解衣耕呢？古代在最旱时，地皮是干的，种不下东西去，于是就把这层干土铲下去，再种东西，然后再把铲去的土放上，直到现在北方还保存着这种耕作方法，叫墪。衣就是地皮。所以是反映了这种生产方法。明白了这个词义之后，有很多古书才能弄清楚左传定公十五年，“葬定公，雨，不克襄事”。什么叫不克襄事呢？不能只说没葬成。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古人有两种葬法，一种是隧葬；一种是下棺。隧葬是天子的葬法，把棺材从隧道里送到坟墓中去，如北京的明十三陵。下棺就是和现在的一般葬法一样，把棺材直接从上面向下到墓穴中去，这是诸侯的葬法。这种葬法和解衣耕有相同的地方，都需要把土挖去，然后再放回来。定公是诸侯，用下棺的葬法，因为碰到下大雨，返土的事办不了，所以没有葬成功。又如诗经“墙有茨，不可襄也”。墙上长了茨，不能把它挖出去。

汉字也反映了社会制度：如宰，宰矣罪人。最初罪字应写作𡥉，𡥉代表屋子，罪人在屋内执事者同宰，可是为什么最大的大官也叫宰？如太宰、宰相，管些事的也叫宰？如厨子叫庖宰。要了解这些意义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必须了解宰这个字的最初的意义。在奴隶社会中，宰本来就是奴隶，后来在奴隶中管点事的叫宰，如礼记曲礼向大夫之室，曰：“有宰食力”。后来做奴隶头了就是太宰。所以汉字反映了社会制度，这与词义关系很大。

因为语言是和社會各方面都有联系，所以汉字反映了形象对词源学很有帮助，汉字反映了社会制度、生产方式对历史学也很有帮助，汉字还反映了风俗习惯对民俗学很有帮助。我们研究汉字必须充分利用汉字的优点——词义的表达。我们要学古汉语就必须认真学习汉字。

2. 语音：

本应靠标音符号来研究，但汉字不能准确地记录语音，不能反映语音的变化，所以我们研究语音就必须另想办法。有人说汉字中有大量的形声字，但形声字还是音节符号，只能大体上看出它的音的系统，而不能准确的求出音素与音素结构，所以必须另想办法。

(1) 韵脚：中国韵文很发达。诗经、楚辞、古歌谣直到现在的民间歌唱，中国一直得重视押韵。我们可以由押韵的情况来放出声音的变化。诗经押韵的方法非常多，孔广森的“诗声正例”对诗经押韵的方法有很多说明。前人就根据诗经押韵的字归纳成 28 韵，这些韵在现在有的不是一个韵，前人根据这些字就规定出个读法来，如“氓”：“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。匪来贸丝，来即我谋。送子涉淇，至于顿丘。匪我愆期，子无良媒。将子无怒，秋以为期。”上面这首诗经显然“蚩、丝、